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图谱

匡存玖
（四川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雅安 625014）

摘要：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与西方现代思潮的频繁碰撞交流中，建构了“结构功能主义美学”“社会主义超现实主义”“实践存在论美学”“精神分析唯物主义”“文学与文化革命美学”“审美符号反映与价值论”等丰富多元的命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现代主义美学、实践美学、符号美学、艺术样式美学等批判范式，建构了以社会实践批判、语言符号学、文化阐释、具体艺术样式为核心的批判阐释维度，彰显了鲜明的实践性、人道主义与文化现代性批判色彩。

关键词：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历史图谱

作者简介：匡存玖，文学博士，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026-(2025)02-0005-12
DOI:10.14185/j.cnki.issn1008-2026.2025.02.020

前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卡冈指出：“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文学、美学问题的讨论不仅仅具有历史意义。现代的研究工作者有理由说：他们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宝库作出了一定的贡献。”① 自1921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以来，先后涌现了“旋覆花社（Devětsil）”“U联盟（U—Blok）”“超现实主义小组”“布拉格学派”“存在人类学派”等流派，与马克思主义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出现了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řovský，1891—1975）、卡莱尔·泰格（Karel Teige，1900—1951）、瓦茨拉维克（Bedrich Vaclavek，1897—1943）、施陶尔（Štoll Ladislav，1902—1981）、尼耶德利（Zdeněk Nejedlý，1878—1962）、科西克（Karel Kosik，1926—2003）、斯维塔克（Ivan Svitak，1925—1994）、卡里沃达（Robert Kalivoda，1923—1989）等产生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美学”“社会主义超现实主义”“实践存在论美学”“精神分析唯物主义”“文学与文化革命美学”“审美符号反映与价值论”等丰富的话语命题，在马克思主义美学领域作出了创新性贡献。由于国内学界对捷克斯洛伐克美学缺乏全面关注，本文主要对其20世纪美学的发展历程、核心命题、贡献启示展开讨论，可为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提供一些理论发展的参考。

① M.C.卡冈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史》，汤侠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15页。以下注释出自该书者不再列版本信息。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一、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脉络

捷克斯洛伐克[①]马克思主义美学开创于20世纪20年代初，历经70年复杂曲折的发展历程。以1921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1945年二战结束、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为时间节点，大致将其分为以下几个发展时期。

（一）理论开创与多元发展期（1921—1945年）：“旋覆花社”成立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启，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思潮频繁碰撞，呈现出多元融合发展局面

“旋覆花社”是捷克斯洛伐克在俄国“十月革命”鼓舞下创立的第一个左翼文艺流派，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寄希望于通过艺术找寻人存在的普遍意义。该社团中许多成员加入了共产党，聚集在诺伊曼（Stanislav Neumann，1875—1947）、恰佩克（Karel Čapek，1890—1838）等人主编的《无产阶级文化》《自由流派》等杂志旗下，致力于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民族文学研究。沃尔凯尔（Jíri Wolker，1900—1924）的《无产阶级艺术》一文，被看作是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的开山之作，强调艺术必须具有党性和革命性，创造适合革命内容需要的无产阶级艺术新形式。但随着本国资产阶级政权的日益稳固和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影响，“旋覆花社”的内部很快出现了一些分化。

首先，以瓦茨拉维克等为代表的学者倾向苏联社会主义文化，主张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核心构建本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倡导“开放、综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研究。施陶尔则基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了“浪漫主义社会学”问题，强调现实与理想的融合。还有康拉德、伏契克、乌尔克斯等人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作具有无产阶级纲领性的现实主义文学与面向社会主义现代趋势的融合，对其革命性、战斗性和服务社会的进步性作了大量讨论。对此，卡冈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国际意义的重要理论思想，他们为论证新艺术的理论原则进行了积极的斗争，从而反击了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似乎只是苏联特有的现象、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的评论家们”[②]。

其次，以泰格、维杰斯拉夫·内兹瓦尔（Vitezslav Nezval,1900—1968）、穆卡洛夫斯基为代表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与象征主义、达达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等思潮融合，开创了“诗意主义”“超现实主义美学”“结构功能主义美学”等多元美学。泰格主张通

① 捷克斯洛伐克是1918年至1992年期间存在的东欧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瓦解，捷克与斯洛伐克两地联合于1918年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1918—1948年）。1948年“二月革命”后建立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1948—1989年）。1989年“苏东剧变”后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1989—1992年）。1992年发生“天鹅绒事件”，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又解体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独立国家。

② 《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第215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过“诗意主义”将生活与艺术融合为一体，让艺术成为生命的艺术，或让生命本身成为艺术，从而超越无产阶级革命方向中的“事物性本身”，实现彻底的社会革命。其后，他同内兹瓦尔一起又转向所谓的“社会主义超现实主义”研究，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重在肯定现实、歌颂政治，而社会主义超现实主义重在批判现实异化，引导人在通往自由和重生中展示其强大生命力。因此，两者应该是互补关系而非对立关系。还有穆卡洛夫斯基借鉴马克思主义改造俄国形式主义并创立了结构功能主义美学，实现了由艺术文本自治研究向艺术的社会过程及历史主义研究的突破。对此捷克学者米兰·布拉辛卡强调，“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几乎所有代表都写到了先锋派作品，这并不令人惊讶”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美学、超现实主义美学频繁发生批判论争。首先，康拉德、卡兰德拉等人对穆卡洛夫斯基的结构功能主义美学展开了辩证分析，既批判其割裂文学研究与现实的联系，走向机械与原子化分析倾向，也赞扬其“走向辩证唯物主义文学研究的一步”②，对文学作品作出专业化分析，希望辩证唯物主义能够“接管”某些科学成果。这反过来又促进穆卡洛夫斯基进一步从结构主义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其次，施陶尔、卡兰德拉等人也对泰格的超现实主义美学展开批判，既批判其过度强调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削弱艺术作为教育工具的功效，同时也肯定了超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积极关系。对此，泰格则予以积极回应，认为超现实主义可以介入广泛的社会政治生活，在反法西斯主义和批判资产阶级异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理论批判与探索论争期（1945—1968年）：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反教条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背景下得到持续发展，诞生了存在人类学学派，复兴了布拉格结构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并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过激烈的对抗与论争

这一时期，以尼耶德利、施陶尔为代表的学者系统建构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原则及方法。尼耶德利提出“真假现实主义”的命题，认为“真”的现实主义艺术必须是真正的艺术而不是粗劣、笨拙的手艺，是进步的艺术而不是对反动的掩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艺术的高级类型。施陶尔则基于“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目的提出了“文学与文化革命美学”，强调文学与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科技革命等同等重要，是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的重要手段；艺术要“保持革命性的力量，激动人心，破除偏见，唤醒斗争，为争取更深入彻底的自由而斗争”③。

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官方过多采用行政手段干预文艺活动，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庸俗化与教条主义倾向，所以一些学者开始在“反教条主义”旗帜下运用西方现代思潮改造马克思主义美学，由此诞生了存在人类学学派，复兴了结构功能主义美学

① Milan Blahynka. Ladislav Štoll a česká meziválečná umělecká avantgarda, *zvláště Vítězslav Nezval, Česká literatura*, 1982, Vol.30.

② 波利亚科夫编：《结构—符号学文艺学：方法论体系和论争》，佟景韩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298页。

③ Ladislav Štoll. *Face to Face with Reality*. Trans. Stephen Jolly. Prague: Orbis, 1949, p.54.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和超现实主义美学。首先，穆卡洛夫斯基的许多追随者基于结构主义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如沃迪奇卡将结构类型学原则运用于捷克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分析，展开了文学历史与阅读过程中的结构类型学探讨；赫瓦基克探讨了结构主义美学在辩证发展中的哲学性和人类学特征，将文学艺术视作结构发展历史过程的产物。其次，以埃芬伯格、里伯法拉（Libor Fára）等为代表的学者从人的角度理解超现实主义，强调艺术对被操控世界的文化反抗和参与社会的革命性变革，复兴了超现实主义美学。值得注意的是，以科西克、斯维塔克、卡里沃达、马霍韦茨为代表的“存在人类学派”，从存在主义与人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强调人的问题和异化问题应该成为哲学和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研究。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官方确立为“唯一正确”的创作原则，与结构功能主义美学、存在人类学派发生了激烈的批判与论战。施陶尔、多斯塔尔基于“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其他多元思潮展开了激烈批判：“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美学与艺术学中，虚无主义倾向逐步得到加强，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的影响日益扩大。被科学扔掉的陈腐图式在理论中又死灰复燃了。这表现在一系列学者局部地重新回到结构主义的立场。开始流露出这样的思想如：民族的独特性，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下利用苏联经验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的不可能性，重新考虑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与人的学说的‘适合时宜性’；这一切在六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哲学中引起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困难。”[①] 与此同时，结构功能主义美学、存在人类学派、超现实主义美学则主张建设“开明、综合”的马克思主义，恢复讨论战前的结构主义和先锋主义。沃迪奇卡则批评施陶尔将结构主义置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语境下，无法进行专业、有效的批判性评估；赫瓦基克、苏斯、诺瓦克等人为超现实主义美学辩护，认为先锋主义是现代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潮流。

（三）“正常化”与“第二文化”研究时期（1968—1989年）：非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潮受到严厉批判，许多学者转向文学史及理论研究，用信息论、符号论重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映论

1968年“布拉格事件”发生后，结构功能主义美学、存在人类学派、超现实主义美学发展中断并受到严肃批判。施陶尔、多斯塔尔、夏波乌克等人针对所谓的“无边现实主义”、结构主义、现代主义等展开逐字逐句的批判，并加强了社会主义文化政策在文艺与美学领域的解读。布里亚内克、布拉欣卡（1933—）等人转向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学史研究，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先锋派文学进行了评述。同时，夏波乌克（Šabouk Sáva，1933—1993）、瓦罗什（Marian Váross，1923—1988）等人试图运用符号论、信息论解释艺术反映论及其信息本质，从哲学角度研究了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美学问题，强调现实主义依然是现代艺术理论的关键性概念。

① 《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第221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由于严格的审查制度，许多学者无法在官方认可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只能以“地下”形式或在海外发表论文，形成了所谓的“第二文化”研究。切尔文卡、扬科维奇继续从形式语义学角度阐释结构功能主义美学，穿插进了诗歌韵律、诗歌形态学研究。移居海外的学者多列泽尔（Lubomír Doležel，1922—2017）、赫瓦基克对结构主义的哲学起源、美学原则、哲学与历史的结构性互动关系进行考证，开创了辩证结构主义人类学。20世纪80年代政治语境逐渐宽松后，一些新生代学者也对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等充满了兴趣。诸如库比诺娃（Marie Kubínová，1932—2020）、马楚拉（Vladimír Macura，1945—1999）等人关注结构功能主义美学、苏联结构主义文艺学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神话展开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分析。

1989年“苏东剧变”后，捷克与斯洛伐克分家，不再实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官方价值倾向由马克思主义转向了西欧自由主义，学术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有限。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美学被当成思想史的遗产得到一定关注。诸如别洛赫拉德斯基（Vaclav Belohradsky，1944—）及其新一代捷克知识分子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甚至产生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想法，他们越来越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也是现当代捷克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应当成为一种不可抑制的思想冲动，而不再像之前被认为是一种“诅咒”。

综上，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历经了百年发展历程，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频繁地碰撞融合。捷克斯洛伐克最早成为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思潮碰撞的前沿接合部，倾向苏联马克思主义与倾向欧美现代主义的两股思潮频繁碰撞融合，建构了异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形态。二是美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密切。诸如社会主义先锋主义以形式革命、诗歌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为目的，具有鲜明的先锋政治与革命色彩；结构功能主义美学也将形式革命、结构革命的触角延伸到社会、政治与文化领域，开创了文学社会学、文艺政治学等领域研究。三是理论样态多元性和异质性。诸如超现实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与诗意主义、精神分析、超现实主义融合的结果；结构功能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融合的产物。即使是瓦兹拉维克开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倡导构建一种“开放、综合”的理论体系，甚至体现出某些先锋主义色彩。

二、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核心论题

20世纪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在频繁的理论碰撞融合中建构了丰富的理论话语与命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话语张力与复杂性。

（一）结构功能主义美学

结构功能主义美学又称“布拉格结构主义美学”“结构功能马克思主义美学”。这是以穆卡洛夫斯基、沃迪奇卡、多列泽尔等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成员运用马克思主义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改造结构主义，或将结构主义嫁接于马克思主义而建构的美学理论，对结构主义、接受美学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首先，结构功能主义美学强调将美学纳入社会历史语境中考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形式社会学、结构主义文学史、结构主义叙事学等文艺与美学领域。穆卡洛夫斯基较早将文学艺术纳入社会历史语境中审视，既将艺术看作是一种自主发展的审美符号系统，也将其视作社会共同体成员交流的重要中介，体现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色彩。沃迪奇卡将结构类型学原则运用于文学史的进程和文学结构的发展变化研究，建构了一种“不限于文学领域的动态结构主义”①，开创了结构主义文学史领域研究。多列泽尔则大量借鉴吸收了苏联结构主义文艺符号学的方法论路径，注重用统计学与函数分析文体学、发展语境、风格类型、叙事模式等，考察现代史诗的宏观与微观叙事的逻辑结构、框架及叙事方式，探究文学作品中可能世界与虚构世界的“真值”问题。

其次，结构功能主义美学提出了“前景化”“审美功能”“审美规范”“审美价值”“艺术意向性”“具体化”“艺术语义学”等一系列富于理论话语张力的命题，影响深远。诸如穆卡洛夫斯基提出的“前景化”概念，事实上建构了一种马克思主义“语境论”美学，“预示了20世纪美学研究中的语境论转向”②；而“审美价值”“艺术意向性”等概念，则将艺术纳入审美结构符号系统和集体意识当中审视其运行规则及“语义能量”，体现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色彩，对接受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还有扬科维奇的艺术语义学，将艺术解读为一种意义过程或事件，即意义复合体或深层意义活动，主张纳入社会历史语境分析，对其作概念变量或语义的分析，考察审美态度及其在艺术中的实现，分析艺术风格及个人的独特体验，全面把握其作为人类存在的意义。

（二）超现实主义美学

超现实主义美学又称“社会主义超现实主义”。这是以泰格、内兹瓦尔、埃芬伯格等人基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超现实主义融合而建构的重要命题，全面阐述了超现实主义革命美学的理论内涵、心理模式、想象机制、冲突原则，体现了用现代主义改造和提升马克思主义美学阐释力的努力。

首先，超现实主义美学被解读为一种关乎革命与自由的艺术。泰格认为，超现实主义艺术本身就是一场革命，体现着较强的社会革命与批判功能。事实上，超现实主义的主要目的就是“对那个时代不断变化的政治光谱做出敏感反应”③，“既是描绘社会动荡的‘地震仪’，也是时间旋转的‘风向标’”④。原因在于，超现实主义艺术革命主要源于现

① 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59页。

② 杨磊：《重估“前景化”：布拉格学派的美学贡献》，载《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

③ Eric Dluhosch and Rostislav Švácha. *Karel Teige/1900–1951: L'Enfant Terrible of the Czech Modernist Avant—Gard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p.10.

④ Effenberger, Vratislav. *Vývojové proměny v umění*, Praha:Nakladatelství československých výtvarných um ě lců,1966, p.466.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实中的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而其目标也同社会革命的目标极其相似，它批判社会异化及其现代性危机，推动社会革命的发展，引导人在通往自由和重生中展示其强大生命力。更为重要的是，超现实主义将人交给由快乐原则支配的另一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超越了现实世界的束缚，从中获得一种在当下现实世界之中无法获得的快乐感和满足感。正如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与人类解放的必然和由快乐原则支配的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社会主义超现实主义对应着共产主义，必将成为艺术发展的巅峰阶段，并加速社会革命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

其次，他们系统阐述了超现实主义美学的运行机制、内在模式。泰格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寻找灵感和考察艺术的内在模式。他将艺术的内在模式定义为："一个具体的非理性想法，是从无意识的精神源头发展而来，并以性欲的力量为模型。"[①] 超现实主义既然是人类解放与自由生命的精神形式，就势必从精神分析、无意识等维度对其进行考察。他主张对艺术创作的无意识过程及其内容进行"具体化"，分析"欲望星云"、记忆的不确定性、"诞生"的本能等背景潜藏的无意识运行机制。在泰格"内在模式"基础上，埃芬伯格发展了"意识模型"的概念，认为"意识模型"将意识预设为一个整体系统，拥有强大的整合能力和"创造神话的力量"："也许将这些创造神话的功能称为意识模型的实现会更准确，通过它形成个体的意识系统，在辩证的相互关系中将意识塑造为意义模型，所谓的客观事实，同时也被塑造成一个旨在实现该模型的系统。"[②]

（三）实践存在论美学

这是以科西克、斯维塔克、马霍韦茨（Milan Machovec，1925—2003）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他们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从实践维度理解社会存在，全面推进现代性批判、人类存在意义、艺术现象学、电影人类学等领域研究，充满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意义，彰显出实践存在论的思想。

首先，他们从人的角度理解实践，探讨人的存在的意义，开创了实践存在论美学。如马霍韦茨就系统考察了现代人存在的意义危机问题，提出了应对现代性危机的相应解决方案。他认为，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永恒"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应当是一门令人鼓舞的"人的哲学"。尽管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着人的问题，但在严峻的现代性危机面前，又无法将人的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核心位置。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拒斥存在主义，相反，应当吸纳存在主义。事实上，存在主义已经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在解决现代人危机上的缺陷。那么，如何具体实现人的存在或人道主义目标呢？他认为可以通过对话的形式。对话的前提是向对方敞开心扉，表达和传递自身所有的想法。而真正的对话蕴含了个人承诺和为自身的意见负责的态度，有利于促进对话双方的人性化，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人性化。为此，他提

① Karel Teige. *Odpověď na anketu*, in Výbor z díla eds., *Osvobozování života a poezie*, Praha: Československý spisovatel, 1994, p.412.

② Vratslav Efenberger. *Okruh pět objektů*, Praha: Československý spisovatel, 1964, p.12.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出三种对话形式，即个人与自我的对话、“我—你”的对话、与历史人物的对话，以便应对现代人存在的意义危机。其中，个人与自我的对话是对话的最高形式。只有通过这种对话，才能真正找到通往存在之路。可惜的是，现代人已不再拥有这种能力，因为他已经被外部世界分心而无力专注于自己的内心生活。这也促使马霍韦茨进一步走向了对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一致性问题的探讨。

其次，他们深入具体艺术样式展开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融合分析，开启了戏剧人类学、电影人类学、艺术真理论、辩证意义论等系列分析。诸如斯维塔克从存在主义维度考察人及其戏剧、电影等艺术，建构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存在论美学。他认为：“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人主要被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①] 这是因为，人是一种社会性、文化性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具体的存在；人能够决定自身的行为方式，同时也能够决定自身并完善自身的存在。基于对作为存在的人的认识，斯维塔克建构了艺术存在论美学。一方面，他从存在主义角度批判了艺术的异化。诸如电影，他认为其过多受到了商业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的限制，“带给消费者一种奢侈的错觉；提供一种独特的环境和一种对现实不加批判的印象”[②]，从而没有真正反映出社会的状况，导致了意识形态幻象。因此，真正的艺术不是用节日之优美弥补日常之丑陋，而是要尝试用不同方式唤醒人们的审美接受能力，创造审美的现实。另一方面，他主张通过艺术揭示现代性和深刻的人性。在他看来，最伟大的电影制作要能够在社会变革的语境下看到电影的社会使命，发挥揭示现代性和深刻人性的功能，为我们提供理解人类现实的可能性。再比如诗歌，不仅构成了人之自由和反对异化的方式，而且将创造力、自由、人道等作为人之存在的基本价值的确证。

（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基础上发展，不仅纳入了本国社会与历史维度的考量，而且广泛吸收符号论、信息论、系统论等自然科学元素，建构了“浪漫主义社会学”“真假现实主义”“文学与文化革命美学”“审美符号与信息反映论”等系列话语，极大提升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阐释活力。

首先，以瓦兹拉维克、施陶尔、夏波乌克等为代表的学者深入秉持“开放、综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设理论，结合本民族的文学传统，深入挖掘了其中蕴含的深厚人文主义精神。诸如施陶尔提出的“浪漫主义社会学”植根于本民族的现代文学与美学传统，不仅关注社会群体意识，也关注个体心灵，强调“有必要追踪个人内心生活中的那些过程，这些过程是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化所决定的”[③]。而他的“文学与文化革命美学”也是如此。诸如他强调文学与文化生产同工人、农民的物质生产一样，都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生产

① 伊凡·斯维塔克：《人和他的世界：一种马克思主义观》，员俊雅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1页。

② Ivan Sviták. *Film in the manipulated world*, California:Chico, 1977, p.34.

③ Jaromír Dvořák. *Štollův leninský přístup ke kulturnímu dědictví*, Česká literatura, 1982, Vol. 30.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使用价值的劳动生产和创造性的物质与精神生产活动。而且，他还将“创造性”作为衡量“文化生产”价值的标准，用于衡量作家是否体现出解放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可以说，“文学与文化革命美学”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而且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发展、解放和异化思想中蕴含的人文精神，“赋予社会生活最具人性化的意义”。[①]

其次，捷克斯洛伐马克思主义者将符号论、信息论、系统论等自然科学知识引入马克思主义美学，重新解释了现实主义反映论、价值论等问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研究注入了理论活力。诸如夏波乌克用信息解释了艺术的本质，对艺术结构及其实践本质作出新的解释。他将艺术及其意义表达视为一种关于现实或实践的信息，认为艺术“承载着对人类现实、生活及其问题的特殊类型的信息，激发了它对生活价值的自由”[②]。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将艺术纳入到符号反映的交互系统中，审视其运行机制，认为艺术即是研究“客观与主观辩证互动关系的反映”[③]，“一致性”和“差异性”构成了审美信息反映的重要基础。此外，布罗日克[④]（Vladimír Brožík，1930—2008）、瓦罗什、库克林科娃（Kuklinková Teodora，1930—2012）等学者将审美价值视为审美对象功能的重要品质，试图从价值品质和功能的联系中找到新的研究思路，全面考察了审美个性、审美态度、审美规范和审美理想。对此卡冈指出，“对艺术反映的价值说方面和征候学方面的注意，使人有可能以新的方式来说明现实主义这个老问题”[⑤]。

三、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价值贡献

尽管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发展中存在非马克思主义化、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理论僵化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其在发展中所作的一些理论尝试与创新，包括其理论发展的问题与教训，都可以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提供一些理论发展的借鉴。

首先，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历程，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美学、实践美学、符号美学、现实主义美学、艺术样式美学等不同研究范式。

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发展历程，大体呈现了两种色彩迥然不同的思想倾向：一派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关系密切，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① Ladislav Štoll. *Literatura a kulturní revoluce*, Praha: Československý spisovatel, 1959, p.16.

② Šabouk Sáva. *K metodologii literární vědy a kritiky*, Česká literatura. 1974, Vol.4.

③ Šabouk Sáva. *K metodologii literární vědy a kritiky*, Česká literatura. 1974, Vol.4.

④ 也译为布洛日克。

⑤《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第222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另一派则同西方现代思潮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程度借鉴吸收了立体主义、象征主义、诗意主义、超现实主义、精神分析等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开创了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多元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频繁发生碰撞与融合，其中既有激烈的批判与论争，也有频繁的对话与思考，更有创新性的建构。相关论争包括：一是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先锋主义围绕本国优秀文化遗产继承和诗歌形式与革命性、情感性问题的论争，导致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诗意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分化与发展。二是20世纪30年代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美学围绕形式与结构辩证性、唯物性的论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之先声。三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围绕超现实主义革命性问题的讨论，深入发掘了超现实主义美学的马克思主义特征。四是20世纪50—60年代围绕“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批判论争，持续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解和认知。五是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结构主义、现代主义的集中批判，导致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进入了所谓的“正常化”时期。

在此过程中，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摸索出了一条“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路径，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美学、现实主义美学、符号美学、实践美学、艺术样式美学等多元批判范式。一是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美学批判范式。以泰格、内兹瓦尔、埃芬伯格为代表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与立体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观念融合，创立了社会主义先锋主义、诗意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理论流派，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的研究路径与批判范式。二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批判范式。以瓦兹拉维克、康拉德、伏契克、施陶尔、尼耶德利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展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浪漫主义社会学、文学与文化革命美学、审美符号与信息反映论等观点，强调立足本土化建构一种综合、开放的现实主义美学。三是马克思主义符号美学批判范式。以穆卡洛夫斯基、沃迪奇卡、卡里沃达等为代表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结构功能美学研究，或用结构功能语言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美学，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批判之先声。四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批判范式。以科西克、斯维塔克、马霍韦茨、普鲁查等为代表的学者运用存在主义与现象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人的实践问题作了大量讨论。五是马克思主义艺术样式美学批判范式。泰格、埃芬伯格、穆卡洛夫斯基、内兹瓦尔、涅耶德勒、斯维塔克、希姆涅克等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对诗歌、建筑、绘画、电影等艺术样式都有专门研究，造就了马克思主义艺术样式美学研究的兴盛。

其次，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发展中建构了异常丰富的理论话语与命题，开启了社会实践批判、语言符号学批判、艺术样式批判、文化阐释批判等阐释路径，体现了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理论创新精神。

无论是捷克斯洛伐克早期的社会主义先锋主义、超现实主义美学，还是后来结构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功能马克思主义美学、存在人类学美学，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建构了大量的理论话语与命题。比如，泰格、埃芬伯格等人提出了“诗意主义”“辩证意义的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内在模式”“艺术现象学”“审美功能主义”“实验艺术”等系列概念；穆卡洛夫斯基、沃迪奇卡等人提出了“艺术结构主义”“前景化”“艺术符号”“审美功能”“审美规范”“语义结构”“语义整体”“艺术意向性”“艺术作为一种制度性事实”“动态美学”“文学史结构主义”“文学史的具体化”“审美价值等级体系”等大量概念与命题；科西克、斯维塔克、卡里沃达、里赫塔等人提出“戏剧人类学”“辩证结构论”“辩证意义论”“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分析唯物主义”“精神分析神话学”“现代科技革命美学”等系列概念命题；瓦兹拉维奇、施陶尔、尼耶德利、沙布克等人提出了“浪漫主义社会学”“真假现实主义”“综合、开放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符号价值与反映论”“文学与文化美学”等理论话语与命题。尽管这些理论命题和话语存在非马克思主义化、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问题，但并不妨碍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前提下将其作为特定历史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不同理论尝试与努力，展现了捷克斯洛伐马克思主义者创新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体系的理论勇气。

可以看出，20世纪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者分别从现实政治、语言学、文艺样式、历史文化等角度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建构，形成了以“政治—现实—社会实践”为核心的社会实践批判维度，以“形式—结构—语义功能”为核心的语言符号学批判维度，以“文学—艺术—生活样式”为核心的艺术样式考察维度，以“历史—意义—价值建构”为核心的文化现代性阐释维度。无论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还是超现实主义美学、存在人类学美学和结构功能主义美学，不仅深度介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与现实领域展开批判，重视文学艺术对人的存在、生活意义、精神意识等方面的追寻，而且广泛借鉴吸收了结构主义、符号学与自然科学知识，深入到诗歌、建筑、绘画、电影、宗教、日常生活等各个具体艺术样式领域展开研究，彰显出了深厚的理论阐释与话语活力。

再次，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发展中直面社会现实，关注人的发展与实践，体现了强烈的革命实践批判、人道主义与文化现代性批判色彩。

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直面现实发展，体现了鲜明的革命与实践的批判色彩。诸如施陶尔的文化革命美学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彰显了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融合的情怀；科西克、卡里沃达、斯维塔克倡导建设“民主和人道主义面孔的社会主义”，其实践存在论美学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发挥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还有沃迪奇卡的结构主义文学史，泰格、埃芬伯格的社会主义超现实主义美学都彰显出了鲜明的先锋革命色彩。

同时，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关注人的自由与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人道主义批判色彩。他们将青年马克思的人文主义思想与存在主义融合，运用结构主义、超现实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主义和自然科学知识深化了现代性“异化”批判和“人化”批判，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浪潮。诸如穆卡洛夫斯基坚称美学研究应该从一般的人本主义基础出发，卡里沃达将自己的“辩证结构主义美学”称之为人本主义现象学；科西克、里赫塔等人批判人的异化和意义操控，把人的创造性和个体的自我实现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更为重要的是，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植根于本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时纳入了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化语境的考量，对社会政治、日常生活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审美现代性异化及其意义危机展开了深入批判，彰显出了极强的文化批判色彩。诸如科西克的实践存在论美学就以其文化现代性批判而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泰格、埃芬伯格的社会主义超现实主义美学因其对艺术的历史考察和先锋色彩而在诗歌、绘画、建筑、电影等领域备受关注，持续掀起了捷克斯洛伐克艺术与文化发展的新浪潮。

综合来看，捷克斯洛伐克曾与中国具有相似的政治文化语境，并基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文艺理论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具有重要参照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于21世纪初曾遭遇到国内外学界的巨大挑战。作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美学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拥有以往所没有的诸多历史与现实发展机遇。捷克斯洛代克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基于社会主义发展和反思提出来的重要美学理论，通过对20世纪捷克斯洛代克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研究，可以反观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的建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的反思与重建具有重要参照意义，某种程度上可以突破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一些困境，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提供良好的理论资源。

［该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1945-1989）》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CJJ23ND290］

Historical Mapping of Marxist Aesthetics in Czechoslovakia

Kuang Cunjiu
(College of Humanities,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a’an, China)

Abstract: In the frequent collis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Czechoslovak Marxist Aesthetics and Western modern thoughts, it has constructed such diverse propositions as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aesthetics”, “socialist surrealism”, “practical ontology aesthetics”, “psychoanalytic materialism”,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aesthetics”, “aesthetic symbol feflection and theory of value”, and other rich and diversified propositions, which have created Marxist realist aesthetics, modernist aesthetics, practical aesthetics, semiotics aesthetics, aesthetics of art atyles, etc., constructing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dimension centered on the critique of social practice, linguistic semiotic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specific art styles, and manifesting a distinctive practicality, humanitarianism, and the critical color of cultural modernity.

Key words: Czechoslovakia; Marxist aesthetics; historical mapping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